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中国当代性文化 (精华本)

——中国两万例

『性文明』调查报告

- 主 编 刘达临
- 特约主编 吴敏伦
- 副主编 仇立平
- 顾问 E·J·黑伯乐

SEXUAL BEHAVIOUR IN MODERN CHINA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G122/17

中国当代性文化 (精华本)

——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

主 编 刘达临

特约主编 吴敏伦(香港)

副主编 仇立平

顾问 E·J·黑伯乐(德国)



0

21512628



1512628

(沪)新登字117号

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

——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

著 者 / 刘达临

责任编辑 / 林耀琛

装帧设计 / 宋珍妮

责任制作 / 魏志荣

责任校对 / 李厚安

出 版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20)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学林出版社联合发行部

(200020)中国上海市永嘉路25弄8号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1995年5月第1版

印 次 /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字 数 / 220千字

印 张 / 11

印 数 / 1—3000

定 价 / 19.80元

ISBN7-5426-0835-5/C·3

序

[德] E. J. 黑伯乐^①

对我来说,向中国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献上一些祝贺之辞,既感荣幸,也是莫大的愉快。

这种系统的调查在许多国家中都有着可敬的传统,例如从德国的赫希菲尔德 1903 年和 1904 年所作的开拓性的努力直至美国的金西 1948 年和 1953 年所作的著名的《金西报告》。但是不幸的是,这些开拓性的性科学研究在发表的初期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和充分的赞赏,相反,赫希菲尔德的研究由于法院的命令而被迫中止,金西所得的私人经济资助也由于政治压力而被取消。只是在很久以后,艾滋病的传染问题爆发了,那些扼杀过性科学研究的政府认识到过去的这些错误,而过迟地呼吁着需要这方面的资料了。经过几十年的否定、嘲笑、阻挠和公然的禁止以后,主管健康的权威部门突然要求性学家们迅速而准确地告诉他们目前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有多少,同性恋和双性恋有多少,在每个国家、城市和农村地区有多少卖淫者,为了掌握这些因素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他们还要知道在不同的人群中所流行的多种性技巧。在这种情况下,痛苦而被激怒的性学家们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夜

^① E. J. 黑伯乐教授(Prof. Erwin J. Haeberle)是国际著名的性学家,艾滋病专家,前世界性学大会主要组织者之一,曾任美国旧金山性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德国社会科学与性研究中心主席。

之间是找不出来的；他们曾经长时期但是徒劳地寻求研究资金，因为性研究需要稳定而持续的支持和大量的时间才能获得有意义的成果；一个简单的调查从来是不够的，它要重复多次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性学研究在任何环境中都是困难的，它需要有特殊的训练，而这种训练只有在建立了相当时间的性学研究所中才能进行。

• 换句话说，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性学研究从未得到它应该得到的理解，结果是这些国家对人们性行为的实际情况茫无所知。

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流行病学家们既然在这方面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于是就转向一些老的调查、主要是《金西报告》，企图把这些数据不仅用于现在和将来，而且用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去。他们希望通过这条道路能测知艾滋病得以流行的原因。然而，人们很快就明白了，通过这种简单的做法不可能得出什么精确的预见。

每个国家中的每个阶级、每个血缘群体、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性文化，对此都应该调查研究。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些性的亚文化，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会在其中相互作用，从而创造出特殊的性爱环境和生活方式，例如在押者、青少年团伙、同性恋圈子和街头、妓院、“应召女郎”等不同类型的妓女。这种亚文化当然并不存在于每个国家，但是它显示出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转移的巨大可变性。既然这些人对他们自身的性行为来说是最好的专家，他们就被视为预防艾滋病运动的重要的目标群了。在规划、设计恰当的预防措施和有关资料时，这些人是非常有用的，他们懂得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去散发这些资料，同时他们希望得到必要的信任。简言之，在这种性的亚文化存在的地方，他们就能成为健康工作者防止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极有价值的同盟者。反之，如果那些健康部门的官员强制或压迫这些潜在的同盟者，就不仅会脱离这些亚文化的成员，而且会脱离一般群众。所以，对性学家来说，去寻

找生活在特殊社会环境中的性群体,和他们交朋友,支持他们,向他们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赫希菲尔德和金西都是他们的后继者的典范。

这也告诉我们,性学研究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远远地超过疾病预防。它纪录了性行为的极其多样化从而使立法者对人的自然性具有更为实际的观点,于是导致了在欧洲和美国对那些有关性的许多不必要、不合理甚至有破坏性的法律的改革。结果是,在这些国家中,性苦难和性诈骗的数量大大减少,警察们能以更多的时间去和严重的犯罪作斗争,社会的安宁与稳定一般地得到了加强。

另一个被证明有巨大价值的性学研究领域是对性功能障碍的治疗,特别是玛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人类性反应的生理过程有了新的和更正确的认识。这样,就有可能发展那些能够造福于存在性功能障碍问题的夫妻的新的治疗手段。现在,在许多国家中,性治疗已成为一种被承认的学术性的和专业性的工作,由于这些工作,那些过去得不到帮助的夫妻和个人恢复了他们的性能力。

然而,如果我们撇开这些功利主义的观点不谈,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性研究作为人们了解自身和了解世界的整个力量的一部分,也是很有意义的。基础的性研究需要得到一种支持,即不要求它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过于实用,这样,研究者们才能站在一个在性方面具有开明思想和更深的理论的基础之上。这种基础研究能够而且必须包括许多学术上的训练,从生物学和医学到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所以,开展性研究的一个适宜的途径就是要建立一些训练项目。在这方面,赫希菲尔德和金西是了解的而且也是这样去做的。

赫希菲尔德曾经在1908年编辑了全世界第一份性学刊物,在1913年成为第一个性学学会的奠基人,1919年他在柏林建立了第

一个性学研究所，两年后他在柏林又召开了第一个性学会议。他的研究所从一开始起就综合使用了生物学的、医学的、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方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他的著作中，而且首先反映在他独特的收藏与图书室中。这种情况吸引了全世界的许多来访者，包括贾瓦哈拉·尼赫鲁，当赫希菲尔德进行环球旅行而到达印度时，贾瓦哈拉·尼赫鲁在阿拉汉巴作为主人接待了他。在从1930年到1932年几乎两年的旅程中，赫希菲尔德从柏林到纽约和旧金山，从那里又去了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勒斯坦、希腊和澳大利亚，在各地作了有许多主题关于性学这一新学科的讲演。在1931年他在中国许多全国性的大学讲演，特别是在北京和南京的听众很多，在广州的中山大学的一次讲演竟有1000名学生来听讲。当然，他也访问了上海，和上海妇女俱乐部成员的合影至今还被保存着。

由于中国和德国在性学方面的历史联系，我在1988年获知刘达临教授要组织第一个大型性调查的信息后特别高兴，我们开始通讯联系，而且到了1989年春天，我终于有机会在上海会见了他和他的合作者。在几次吸引人的和有得益的会议和私人交谈中，我有机会提出了一些谦虚的建议和鼓励。从那以后，我们在香港召开的亚洲性学理论研讨会上再次见面，然后又在我自己的学会于柏林召开的国际性学大会上相逢。总之，我们的合作在加强，而且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

刘教授坚持了伟大的性学先驱者赫希菲尔德和金西的传统，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作出了总的决策，并因此而付出很大的个人牺牲。正像赫希菲尔德和金西所做的那样，他也在各个不同的学术界、官方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大小组织中去寻求同盟者和合作者，这种本地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联盟与合作是他的意图和目的严肃认真的最好证明，也是他的研究得以继续开展的最好保证。

现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性调查结果在此出版了,这只是一个开始。正像许多良好的研究一样,它提出的问题多于它所回答的问题。这个调查在许多方面的结论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它和其他多数国家的情况相似。例如,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性教育太保守反映出在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各地非常相似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人有婚前性行为也是较为普遍地发现。男女青少年有早期的手淫行为而且婚龄提高,这种现象也不会使任何人惊讶。可能在将来有更多的专门调查会以新的数据证实这一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现在这个调查报告如果和其他国家相比较,某些数据似乎低了一些。例如,对有经验的性学工作者来说,会对男大学生有手淫行为的数据还不足一半感到奇怪。从合理的可能性来看,这个数据应该大得多。可能在这第一次调查中,被调查者仍旧羞怯于说出真正的事实,也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到回答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设想,在以后的调查中这个数据会高一些。还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大学生中只有7.6%有过同性的性经验,这个数据似乎也低了。另外,使人惊奇的是大学生有过异性性行为的只有10%多一点。这后两个发现会使所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性学家们感兴趣,同时对此可能有多种解释。看来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在以后进行的这一类调查中,这些数据都会增大,特别是发生异性性行为的百分比会戏剧性地上升,最后也会发现发生同性性行为的百分比至少会增大一些。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同时具有异性恋和同性恋特征的人的百分比,那就更加有意思了,在任何情况下,其他国家的性学研究一再表明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当然,绝大多数的男子和女子并不是长期地保持着同性性行为的,但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例如有10%至20%的男子)从青春期以后在一个时期内会有同性性行为,或许他们中间的一半人一辈子都会是这样。从全世界看,这种情况是经常如此,而且被

证明是事实。总之，这正如动物学家金西所指出的，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人具有某些同性性行为只不过是作为哺乳动物的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生物学上的原因可以说明中国人是例外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形成包括同性性行为在内的各种性行为的过程中文化因素就不起作用了，特别是在文化有重大发展、历史发生重大转变时更需要从这方面来阐述和说明人类性行为。我知道这是刘教授下一个研究的重点所在，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将是一项非常有启发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在这个调查中另一个吸引人的发现是有16%多的已婚者报告说他们有手淫行为，无疑地这个发现是带有真理的光环的。最后，这个调查还发现有半数以上的夫妻运用多种方法过性生活，这也反映出生活的真实，说明了中国性文化状况。总的说来，现在这个调查展现了现代中国性生活一般水平的图画，同时还有部分的模糊点有待澄清。

毋庸讳言，发表这个调查报告后，刘教授必须对来自某些方面的大量批评与评论作好准备。性学家是经常被批评的，而且没有个性调查能做到尽善尽美或者如读者所要求的包罗万象。一些专业工作者无疑地会指出这个调查设计和实施中的许多缺点，这种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泰然处之。事实上，每个人都要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所以严肃认真的批评是每个研究者所希望获得的宝贵的反应，它比其他一切都更能推动产生在这方面进行更多更好的研究的兴趣。因此，不论人们对这个调查的最后评价如何，刘教授有一切理由高兴，因为他对中国性科学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最初的而且是极其巨大的动力。不论像刘教授这样的先驱者们的研究是否被人们接受，即使出现了最强烈的攻击来否定他的研究的重要性，他在推动其研究领域发展方面已经确立了令人羡慕的地位。

无论人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他的主要目标是达到了,这就是:每个人都会看到,这种调查是必须进行和再进行的。

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中国人是有吸引力的,同时又有些“不可理解”。刘教授所作的独特的贡献是,他开始向我们显示,他的同胞们在性问题上和其他国家的人是非常相像的,对他们毋需惊奇,因为他们也具有人类的同样需求、同样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刘教授开辟了一条道路,使中国人能进行发自内心的、多角度多层面的对话,得以了解一些有关自身的过去所不了解的事情,同时从中审视他们的价值、希望、理想和欢乐。

我希望这种对话能导致在中国将性学作为一种本来就应该建立的科学事业那样建立起来。我作为一个性学家的经历是曾经在两个国家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在1980年初,我作为研究员在印第安那州伯明顿的金西研究所工作了几年,而现在在德国工作,在那里我注意并了解到刘教授所在的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工作进展。对于欧洲和美国的性学家来说,看到中国性学研究的发展成长会比其他许多事情更为高兴,特别是看到这种发展成长具有社会学的方向更是如此。总之,中国的性学研究如果坚持并发展几年以至几十年,不仅会使我们意义重大地增加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会增加对人类状况的了解。

赫希菲尔德的研究、收藏和图书室和他的整个研究所在1933年成了希特勒和纳粹的牺牲品。直到现在,性科学还没有回归柏林。我是十分高兴于能够重新建立中国和德国之间被中断了的联系,能到中国来访问,而且能在德国欢迎刘教授。我希望这本书能

得到它应有的可喜的欢迎,同时我十分愿意尽我的最大努力来帮助中国的性学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

E. J. 黑伯乐教授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Erwin J. Haeberle'.

Prof. Erwin J. Haeberle, Ph. D. Ed. D.

1991年3月30日于柏林

(林敏译,周奎校)

序

吴敏伦^①

本于学术和社会发展,譬如在性学理论、人口计划、艾滋病控制等工作上的需要,有关人的性态度和习惯的资料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已极为迫切。中国以其庞大人口、广阔地域与高速度的发展和开放,对进行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更已是刻不容缓。

但是,明白中国国情的人都可以了解,在现时中国环境下要做个广泛的性调查,技术上会是多么困难。很明显,中国“性文明”调查只能是一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工作。刘达临教授能够在这样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不计较财力物力和精神上的牺牲,仍然毅然投身去领导这件工作,是令人敬佩的,而这亦是当刘教授邀我参与这调查工作的时候,我一口便答应下来的原因。

在这调查进行期间,外间对这报告的期望甚殷,譬如有些国外人士便称之为中国的金西报告,但那显然只是未能了解这工作的内在困难而引起的误会或过誉。此调查的漏洞和缺点,本报告在很多其他地方都会详细论及,不必在些累赘,我作为此调查的顾问和编辑,亦曾极力强调要承认和向读者明确指出它的各种不足和缺点,以免误导。不过,虽然有其不足,我认为我们仍需承认这调查报

^① 吴敏伦博士是香港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性学家。他于1985年创建了香港性教育促进会,任会长;1992年在亚洲性学研讨会上被选为亚洲性学联合会主席。

告有以下几个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的价值：

1. 它搜集了一大群有关现时中国内地居民的性态度和习惯，以数量和调查内容的范围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所得资料虽然难有全面代表性，但至少反映出一群我们在中国最容易接触到和最关心的人的性习惯和一点心声，提出了很多我们以前可能忽略而由现在起必需开始认真研究或处理的性问题。

2. 它总结了对现代中国几种不同主要群体进行性调查的一些困难和经验，足为后来者的引鉴或参考，从而改进将来在中国进行性调查的技巧和方法。

3. 这调查和报告是由数十个国内各地学者合作完成的，从他们的调查方向、搜集资料的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结论等，可以反映出一些国内学术界人士现时最关心的性问题和他们的性思想，使我们对现代中国的主导“性文化”有一个可足依据的印象及评价。

4. 报告内亦包含很多其他国内外的性调查资料，以供比较和讨论，这些资料都是不易收罗的。

性调查是一种特别困难的社会调查，我们不能以其他社会调查的眼光来看它。一些有社会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即使在性不保守的社会中，一个问卷调查内只要加上有关性的问题，其回收率下降便可超过一半，有效的答案亦大大减少，这问题是几乎无法解决的。希望从性调查中得到可靠的讯息，唯有从经常重复的调查中寻找答案。以这个“性文明”调查为第一个在中国的这类大规模调查来说，即使它完全提不出可信的资料，但若它能激励将来在中国有更多更好更精细的性调查，它的任务已可算完成，而刘达临的努力仍是我们应该感谢和赞许的。

最后，我还要在此向刘表达一个私人的感谢。在做这调查和报告的过程中，我其实并非如刘所说的“吹毛求疵”，而是经常将工作

批评得简直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我很感谢刘能一直都明白我这个“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不但毫不介怀，而且海量包涵、从善如流，不辞作重复的修改，使这报告卒能面世。

吴敏伦

1991年9月于香港

精华本序言

刘达临

自1992年8月《中国当代性文化——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出版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反响。风行全球的美国《时代》周刊及其他一些海外报刊称这部书为“中国的金西报告”；香港《大公报》以《一本中国性科学的奠基之作》为题发表了评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写信给我说：“翻阅了尊著，我认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现在这部奠定我国性文化研究的巨著出版了，不仅是我国的需要，也有全球性意义。”主要由于这个调查和这本书，我于1994年8月在柏林领受了“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

这本长达八百多页的著作两年来几次印刷，仍是脱销，近年来我凡参加一些学术会议，都有不少人向我打听这本书，询问什么地方能买到，来信询问的就更多了。为了满足一些亲朋好友的需要，我几次去了上海三联书店书库寻觅这本书，因为外边的书店早已脱销，可是不久以前，书库中这本书也荡然无存了。我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林耀琛先生商量是否再印刷一次，他说：“能不能在这本书原来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出版一本精华本，让更多的读者便于买，便于看？这样，可以使这本书更普及些。”我听后大为赞成。

原来的这本书有大量的相关变量、大量的数据及其分析，密密麻麻，还附有调查问卷等许多资料。这对专业工作者来说是十分重

要的,但是对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掌握这方面知识的一般读者来说,就显得繁琐了些。为此,把这个调查报告编成两种版本,以适应读者的不同需要,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当代性文化——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出版已近两年了,如果从开始编写时算起,已近四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国有些学者在有些地区又进行了一些中小规模的性调查,这些调查结果既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也是对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的检验与证明。有些调查,如苏州 2196 例已婚妇女性生活调查与凉山州大学生性问题调查都以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作对比。在编写这本精华本时,我想引用一些这方面的新的数据,在和原来的数据对比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原来的数据哪些比较可靠,哪些值得商榷,又出现了哪些新问题。时代在发展前进,我们的这本调查报告也要发展前进。

中国的性学研究发展很快,现在的形势和五年前我刚刚发起要搞全国的性调查的时候不相同了,和十年前我主持全国第一个性学系列讲座时更不相同了。中国性学的春天正在到来,我希望这本书继续为推动我国的性学研究作出贡献。

刘达临

1994 年 8 月

中国“性文明”调查与《金西报告》

这是一本性科学的调查报告，它记载了从1989年2月至1990年4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所进行的中国“性文明”调查的基本情况和基本分析。

这里的所谓“性文明”，包括青少年的性生理发育、人们的性知识及其来源、性观念变革、夫妻关系的和谐、计划生育、性罪错。我们把这些内容概括为“性文明”，因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问题的调查触及了人们生活中最隐私的方面，对家庭幸福、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但是，工作难度很大，当然意义也很大。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巩固与发展婚姻家庭从而稳定社会已经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相应的性问题被重视得并不尽如人意。金西曾指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般都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而且至少许多研究者都相信：男女之间的性吸引一直是人类家庭进化的基础。但是不论家庭是如何产生的，它之所以能延续到现在，性生活显然是基本的因素。……婚姻成败的作用因素极多，性生活状况只是其中之一；但性生活缺乏协调，婚姻的维系就一定会遇到困难。”当然，研究性问题不仅是为了巩固与发展婚姻、家庭，而且对青少年教育、对社会安定团结都有很大好处，一句话，它对社会文明、人类幸福具有很大好处，许多志士仁人